

作为蒙古冲击一环的“蒙古来袭”

四日市康博（昭和女子大学 外聘教师）

原文为日文，翻译：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前言

13 世纪至 14 世纪，蒙古帝国及其继承政权将国家统治范围扩大到亚欧大陆东西方向的各地区，其影响也扩散到了各地区和地域社会。因此，在亚欧大陆的东西方向，出现了一种超越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框架的蒙古式的共同样式¹。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诞生了伴随着蒙古霸权扩张而出现的东西交通稳定局面，即“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²。然而，这一概念归根结底来说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不足以说明当时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能认为这一概念就意味着蒙古帝国霸权下亚欧大陆的和平稳定状态。蒙古帝国与亚欧大陆各地的文化圈及地域社会，时而冲突、相克，时而共存、融合，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着交流。换言之，在亚欧大陆各地区及地域社会，都存在着所谓的“蒙古冲击（Mongol Impact）”，并且，若不能认识到各地区及地域社会针对冲击做出的相应反应，也就无法理解交流的内容及其带来的影响。此时的“蒙古冲击”中，不仅包括了短期性的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影响，还包括了长期性的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即，“蒙古和平”与“蒙古冲击”同时存在，它们是一对表里一体的概念。若想准确把握亚欧大陆整体的“蒙古和平”，就有必要了解亚欧大陆各地区中存在的“蒙古冲击”及随之而来的各地区的应对措施³。

1. 蒙古帝国：元朝的亚洲海疆经略与入侵日本

在研究“蒙古来袭”事件前，必须首先了解蒙古帝国，即元朝对于亚洲海疆整体的经略方针。蒙古帝国的侵略活动层次丰富，波及金朝、高丽、南宋、缅甸、越南、爪哇等国家或地区，并非各个侵略活动单独开展，而是所有活动联动进行。将焦点汇聚到日本上来看，蒙古帝国发动的“蒙古来袭”并非元朝与日本两国间外交的产物，而是高丽国介入其中的三国间国际关系所反映的结果，并且高丽国独立势力“三别抄”也对蒙古和日本两国展开了外交活动⁴。

¹ 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亚欧大陆东西方向沿线上，不论发号施令的文件以蒙古语、土耳其语、波斯语、藏语或是汉语等语言中的哪一种撰写，其文件均采用了相似的文章结构及共通的特定语言。这种在蒙古帝国时期采用共通样式撰写的文件，被称作“蒙古帝国样式文书”或“蒙古命令文书”。详细内容，请参考四日市 2015 与 Yokkaichi 2015 的研究。

² “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也被称作“鞑靼和平（Pax Tatarica）”。此概念最早由 Michael Prawdi 等人倡导（详细内容，请参考 Prawdi 1937；佐口透 1970；四日市 2001）。但是，我们不认为 Prawdi 和佐口等提出的早期“鞑靼和平论”中论及的政治与军事的稳定，在整个亚欧大陆都得到完全实现。归根结底，“蒙古和平”仅仅指代有助于经济面和文化面发展的亚欧大陆东西方向沿线的稳定，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分析概念。因此，仅仅使用“蒙古和平”这一概念表述亚欧大陆上的蒙古帝国政权是极其片面的，若不同时考虑动摇了各地的社会及文化的“蒙古冲击（Mongol Impact）”，实为偏颇。

³ 关于该问题，2016 年 12 月在昭和女子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亚欧大陆中的蒙古冲击：基于考古学和历史学视角的亚洲海域蒙古来袭（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ongol Impact on Eurasia: Arc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Mongol Invasion）”中，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越南、蒙古、澳大利亚、以色列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地域研究学者等做了相关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组织者：菊池诚一、四日市康博等）。该研讨会的成果将于 2017 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发。

⁴ 有关三别抄与日本的交涉，可以参考村井章介 1988(a) 及石井正敏 2010 的研究。此外，有关蒙古侵略以前的南宋、高丽、越南、日本的外交事件，可参考榎本涉 2015 的研究。

众所周知，蒙古帝国进攻日本的建言，来自于高丽国朝臣赵彝⁵。至元二年（1265CE），赵彝建言进攻日本，而在这一时期，高丽国面对蒙古帝国的反复攻势，于中统元年（1260）接受了蒙古帝国的册封⁶；远据南方的越南陈朝也于中统三年（1262）接受了蒙古帝国三年一贡的条约（朝贡），被册封为安南国王⁷；在正式进攻南宋之前，如何与邻国日本相处，就成为了有待观望的问题。在蒙古帝国，依照传统，战争最前线归顺的敌兵将被送入下一场战役的前线⁸。如果基于该惯例，那么新归顺的高丽国士兵就应该被送入下一个战场。然而，在降服高丽之后，尽管蒙古帝国于至元五年（1268）发动了襄阳之战，正式开始进攻南宋，但是史书上却几乎没有留下有关高丽国军队被派遣至南宋战场的任何记载。这些军队不仅被派遣到了珍岛、耽罗（济州岛），以镇压盘踞在二岛的三别抄军队，还被派遣到了海峡对岸的日本，以进攻日本⁹。就入侵日本的军队主体而言，第一次进攻（文永之战）与第二次进攻（弘安之战）时的东路军（来自高丽国的舰队）都是在蒙古帝国统治高丽国的晚期被派往高丽平定了三别抄之乱的忻都的军队，以及从高丽国归顺的洪福源、洪茶丘的军队。换言之，蒙古帝国发动的入侵日本的行为，很明显是经略高丽的延长线上的产物。

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入侵日本的行动与针对高丽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蒙古经略政策齐头并进、联动而行。此时，在东南亚方面，尽管蒙古帝国与越南陈朝在表面上维持着稳定的关系¹⁰，但在与缅甸的接触方面，蒲甘王朝则对被派遣至此的元朝使节表示了反感，且摩擦越来越大。事实上，至元十一年

（1273），第二位派遣至缅甸的元朝使节被蒲甘王朝问斩。受此影响，第一次入侵日本（文永之战）三年后的至元十四年（1276），元朝发动了第一次针对缅甸的战役¹¹。此时，元朝在东方进攻日本、进攻南宋，在南方进攻蒲甘王朝，同时铺开了三条不同线路的战争攻势。第一次入侵日本与第一次入侵缅甸均以失败告终，之后，蒙古帝国意图再次发动进攻。但此时南宋首都临安无血开城，再加上至元十五年（1279）发生了崖山海战，至南宋完全被平定后，蒙古帝国于至元十七年（1281）发动了第二次远征日本。同时，在东南亚方面，进攻缅甸的行动重启¹²；自至元十九年（1283）起，进攻南海交易据点占婆国的行动也逐渐展开¹³；至元二十年（1284）年，蒙古帝国正式向缅甸发起进攻¹⁴。无论哪场战争，可能都是将侵略南宋的军队调配至日本、占婆国、缅甸等国的结果¹⁵。由此可见，入侵日本的行为不仅仅是经略高丽的延长线上的产物，另一方

⁵ 《元史》卷二零八 外夷传一 日本

⁶ 《元史》卷二零八 外夷传一 高丽

⁷ 《元史》卷二零九 外夷传二 安南

⁸ 与该传统相似的做法也可见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自中亚至伊朗的南征进程中扩大领土的活动。《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中留下了相关记录。该书中虽然没有记载以蒙古语表述该传统的词汇，但却有以波斯语表述的 hajar 一词。

⁹ 至元五年（1268），高丽国王上奏元朝廷，称已经备好一万名士兵与一千艘船。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元都统领道尔吉前往检阅军队，同时命令其视察从黑山至日本的路径，而这些谕旨的前提均为将高丽的军队与船只用于经略日本。（《元史》卷六 世祖纪三 至元五年七月丙子）

¹⁰ 实际上，即使是越南，也对派遣至此的督官达鲁花赤及其严格的要求表示了日益膨胀的不满，对蒙古帝国的反感在陈朝太宗去世后，最终升级发展成为了对蒙古帝国的战争。

¹¹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缅

¹² 《元史》卷一一 世祖纪八 至元十七年二月丁丑

¹³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占城

¹⁴ 《元史》卷二零 外夷传三 缅

¹⁵ 甚至于重罪犯人、蒙古士兵、从南宋新归顺的“新附军”，全部都被分配至日本、占婆国、缅甸，参与远征军的讨伐。（《元史》卷一二 世祖纪九 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戌；卷二 世祖纪九 至元二十年五月戊午）

面，也与进攻南宋相联动，而入侵南宋又与东南亚方面的入侵占婆国、越南、蒲甘王朝直接联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入侵日本看作是蒙古帝国即元朝在整个亚洲海域上的政策经略中的一环。

2. 亚洲海域各国受到的“蒙古冲击”

如上文所述，蒙古的军事侵略活动覆盖了东部海域亚洲各国的几乎所有领域，但也正如其名，“蒙古冲击”本身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方面，放眼中长期，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给各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源自蒙古、波及到各地区的“冲击”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但是为了应对这些“冲击”，各地区所做出的“反馈”，也就是政权及社会的反应和冲击带来的社会变容，却各有差异。

高丽国方面，与蒙古帝国断断续续地反复进行着交战与和解。最后，蒙古帝国即元朝迫使高丽态度弱化，高丽便也全面降服蒙古并接受了蒙古的册封。虽然形式上来说高丽成为了蒙古帝国的领属（即属国），但实际上，高丽王朝依然维持着独立的支配权。与此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天山回鹘王国、汪古王国等归顺于蒙古帝国的亚欧大陆中部王朝政权。当然，这些国家直接受到蒙古帝国即元朝的统治政策及财政政策等影响与干预，也正因为如此，受到的来自蒙古的冲击才更加强烈。可以说，这一冲击波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为应对冲击，高丽王朝采取了融合的办法，即：历代高丽国王娶公主（元朝皇帝的女儿）为妻成为驸马（元朝皇帝的女婿），其儿子则作为秃鲁花供职于元朝皇帝的怯薛军（轮番近卫兼精英培养机构），由此，高丽王朝便享受到与蒙古帝国的皇亲国戚相当的优待。在元朝的诸多属地王国中，尤以高丽王国的地位最高¹⁶。此外，高丽的官制也参照元朝的官制进行了重新制定，高丽宫廷的王族与贵族之间逐渐吸收着蒙古文化。一直以来，对于高丽国与蒙古帝国的融合持否定态度的研究倾向显著，但是近年，也有研究者表示了肯定态度¹⁷。我们可以认为，高丽王朝通过积极打入蒙古帝国上层并成为其中一员，由此来享受“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带来的政治稳定与异文化吸收的便利性。举例来说，据森平雅彦的研究，高丽时期王权崇拜佛教的要素在后来的朝鲜时期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对作为体制教学的朱子学的作用强化，而朱子学真正传播到高丽国的时期正是元朝时期。此外，通过与元朝的关系，高丽佛教得以加深与中国佛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的交流。可以说，高丽国在国家性宗教与民众性宗教等两大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¹⁸。

越南则与高丽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南陈朝虽然在遭受蒙古帝国攻击后接受了册封，但却并没有接受蒙古帝国提出的所有要求，蒙古帝国对其内部干预越深入，越南的反抗也越强烈，直至发展至战争。虽然其首都河内升龙皇城沦陷，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还是成功击退了蒙古军队。之后，陈朝决定向元朝

¹⁶ 有关蒙古帝国即元朝内部中高丽皇族的地位及该地位在高丽政权中的反映，可参考森平雅彦 2013 的研究（特别是《驸马高丽国王的诞生》（「驸馬高麗国王の誕生」）（22-59 页）；《高丽王位之下及其权益》（「高麗王位下とその権益」）（60-104 页）；《有关高丽皇族及蒙古皇族痛恨关系的备忘录》（「高麗王家とモンゴル皇族の痛恨関係に関する覚書」）（105-146 页）；《元朝怯薛制度及高丽皇族》（「元朝ケシク制度と高麗王家」）（147-203 页））

¹⁷ 可参考森平雅彦 2013 的研究（特别是《高丽与元朝的关系史研究的意义与课题》（「高麗・元関係史研究の意義と課題」）（1-21 页））和李康汉 2016 等研究

¹⁸ 可参考森平雅彦 2013 的研究 5 页、291-309 页

进贡并释放了蒙古军俘虏，并再次接受了元朝册封¹⁹。基于此，可以认为陈朝得到了实质上的独立权。越南通过朝贡维持住了与蒙古帝国的经济纽带，但成功地排除了来自蒙古帝国的政治干预。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但却故意在形式上表示服从，这种做法使得两国关系从政治关系转变为经济关系。在此之后，“蒙古冲击”也就主要被限制在经济与文化层面²⁰。关于这一点的评价，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做法保住了政治独立性，或者成为了彰显民族主义的开端；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对“蒙古和平”及“蒙古冲击”带来的亚欧大陆即印度洋海域的世界规模经济文化交流的享受，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第三种国家关系模式，则以爪哇国的信诃沙里王朝和满者伯夷王朝与元朝的关系为典型。爪哇与日本一样，最初受到了元朝的招抚但都拒绝加入元朝的册封体系，于是遭受到元朝的进攻，将元军击退后，向元朝派遣朝贡使节。由于史书上没有留下满者伯夷国王被元朝奉为王公的纪录，因此可以认为其没有接受过册封，但在此之后，其积极向元朝进贡，促使爪哇与元朝保持了比战争前更为紧密的通商关系²¹。以“元征爪哇战争”为契机，长期的“蒙古冲击”即伴随着朝贡关系的通商关系得以建立。此外，该通商关系的建立并非源自爪哇国一方的行动，元朝一方发动爪哇战争时也向爪哇周边各国派遣了招抚使节与商人团体。

最后来看看苏门答腊岛的苏木都刺国及南印度的摩度罗（即：潘地亚王朝）与元朝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受到过蒙古帝国即元朝的直接攻击，也没有接受过册封。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元朝没有向这些国家派遣远征军的打算。元朝朝廷内部曾经商讨过向泰国、苏门答腊岛甚至南印度等地的国家派遣兵力的方案，但最后落实为派遣使节，实施诏谕。事实上，至元十七年，库伦、摩度罗、爪哇、越南已经与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至元二十三年，摩度罗、兰里、苏木都刺等十多个国家都在对元朝进贡。在这些王朝当中，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地带的摩度罗（即：潘地亚王朝）在至元十六年至延祐元年之间，有史可循的进贡就多达十几次。与此同时，元朝也多次向摩度罗派遣使节。同样地，13世纪后半期，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新兴伊斯兰教政权苏木都刺王国虽然在次数上不及摩度罗之多，但在至元十九年后，也多次向元朝进贡。总结马六甲海峡以西诸国的朝贡特征，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1）就朝贡的主要目的而言，经济目的大于政治目的；（2）各国并非单独朝贡，周边各国及经由地的使节也同船往来。关于第一点，史书上几乎看不到元朝对马六甲海峡以西诸国实施册封的事例，同时，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末期，出现了来访朝贡使节由于受到针对商人的海禁政策的影响无法归国的情况，由此可见，朝贡使节团当中也包含有不少海上商人²²。关于第二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南海诸国的朝贡使节受到元朝招抚前往朝贡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例中即包含了元朝光耀国威、彰显霸权的目的，也反映出以苏木都刺为代表的海上诸国将蒙古帝国即元朝的霸权作为自己统治权力后盾的意图²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认

¹⁹ 有关元朝经略越南的具体经过，可参考山本达郎 1950、山本达郎 1975、四日市康博 2015(b) 等研究。

²⁰ 有关越南陈朝、占婆国与元朝的通商、经济关系，可参考桃木至朗 2011 及四日市康博 2015(b) 等研究

²¹ 《元史》卷一八 成宗纪一 元贞元年九月丁亥；卷一九 成宗纪二，大德元年十月乙卯

²² 《元史》卷一八 成宗纪一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乙巳

²³ 马可·波罗指出，小爪哇（苏门答腊岛 Java la menor/Giava minore）上的八大王国之中，roiame de Basma/regno di Basma、roiame de Samatra/regno di Samara、roiame de Daroian/regno di Dragoian、roiame de Lanbri/regno di Lambri、roiam de Fansur/regno di Fanfur 等尊称元朝皇帝为大汗（le grant kaan/il gran Can）并予以臣服，但事实上并没有朝贡。（Marco/F, pp. 171-174; Marco/R, pp. 260-264.）

为，中长期性的“蒙古冲击”存在于这些例子中，且在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上都被加以利用。

3. 重新审视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

基于上述事例，笔者将在此重新审视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日本拒绝了来自蒙古帝国即元朝的册封，由此产生的摩擦最终发展成为战争。同样的事例，也可见于爪哇和蒲甘等几个地区。正如上文所述，日本在和元朝的战争结束后，并没有与元朝建立正式的国家间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之间还是呈现出民间商贸往来的盛况。

至治三年六月，一艘自庆元（今宁波）驶往日本博多的商贸船在航行过程中受到风向和洋流的影响沉没，并被冲至了韩国新安海域。这就是有名的“新安沉船”。在该沉船遗迹的船舱内出土了大量货物，其运载的陶器、瓷器、铜钱、紫檀木等货物数量惊人²⁴。该新安船出航的时间点虽然是至元十八年/弘安四年（1281），即第二次入侵日本（弘安之战）发生后的约40年后，但是在这前后四十年间，即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在位的大德年间后期至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在位的至正年间初期，戎克船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元朝之间²⁵。史书上没有留下关于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之后不久便有商贸船往来于两国间的记录，但是记载有战争结束十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派出三艘商贸船驶往中国，其中一艘船成功抵达庆元²⁶。此外，日本留存有扣押了唐船贸易利润的记录，由此可见，两个国家间已经恢复了关系²⁷。也就是说，至少在战争十年后，博多至庆元之间的商贸船恢复了往来，二十年后，日本与元朝的交易已呈现出盛况。第二次日本元朝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即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年间后半期，谋求财政扩大政策的权臣阿哈默德失足落马，紧接着受到维吾尔族宰相僧伽推荐的卢世荣着手财政改革。由于僧伽任命了大量的穆斯林及维族人担任财务官僚，从而与阿哈默德一样谋求财政扩大政策。在这一时期，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海诸国大举向元朝进贡，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也日渐活跃，南海贸易呈现出一片繁荣态势²⁸。然而，榎本涉指出，日本与元朝间的贸易实际上显示出与时代相违背的动向²⁹。如前文所述，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戎克船自元成宗铁穆耳统治时期的后半期才开始盛行，而战争后，尤其截止至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后半期，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全不活跃。其根源就在于元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话虽如此，其原因并不是两次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文永之战与弘安之战）的影响，而是元朝制定了第三次进攻日本的计划。即使是在日本商船恢复与元朝往来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入侵日本的计划也没有停歇。

²⁴ 有关新安沉船的记录，可参考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1981-85;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1988; 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 2006; 川添昭二 1993; 村井章介 2013(a)等研究。

²⁵ 但是，在此之后，由于元朝沿海地区出现了日本人引发的暴动，短期贸易被中止。榎本涉将这些暴动者分别称为“至大倭寇”、“泰定倭寇”、“元统倭寇”，他认为，这些倭寇事件是暴动因素强烈的单次性事件，与明朝时出现的倭寇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一点需要多加注意。（榎本涉 2014，97-98页）

²⁶ 《元史》卷一七 世祖纪一四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己巳

²⁷ 正应三年四月二五日关东御教书（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大悲王院文书 一〇》）；榎本涉 2006，243-244页；榎本认为，13世纪80年代后期存在入元僧，两国交往也重新展开（榎本涉 2006，143-144页；同 2014，95页）。

²⁸ 有关这一时期元朝的财政、商业政策及元朝与南海交易的关系，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的研究。有关马六甲海峡周边各港口王国的海上贸易情况，可参考深见纯生 2004、深见纯生 2006的研究。

²⁹ 榎本涉 2006；榎本涉 2014

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为了实施第三次入侵日本，设置了征东行省，并任命阿塔海、刘国杰、陈严、洪茶丘等人为宰相³⁰。次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圣旨，要求暂缓进攻日本，优先进攻越南，同时由于临近高丽的东方三王家领的叛乱持续不断，因此进攻日本的计划被宣告中止，直至东方三王家领叛乱、越南战争、占婆战争、爪哇战争都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该计划才再度被提上日程。高丽国王忠烈王对此表示赞同并开始为入侵计划做着相应准备³¹。然而，此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已经高龄，并于两年后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驾崩，第三次远征日本的计划便也随之告终。换言之，第一次和第二次入侵日本结束后的十年间，还不能称之为“战后”。倒不如说，只要条件俱全，第三次远征日本随时都有可能在忽必烈的指示下立即开展，因此将这段时期称为“战争即将发动时期”也不为过。与元朝相临近的越南、占婆国亦是如此。不过，与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最终流产不同，在两次日本战争之后，元朝对越南和占婆国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战争，甚至还在此之后向爪哇派遣了远征军。这一差异之所以存在，其最大的因素就在于越南、占婆国、爪哇都位于当时南海贸易主干线的要塞位置，而日本却远离当时元朝海上交通大动脉的主干道。与经由越南、占婆国的“西洋航路”不同，连接日本、琉球、福建、马尼拉的“东洋航路”直至16世纪以后，其重要性才逐渐凸显出来³²。此时，元朝优先经略的是经由南海通往伊斯兰各国的“西洋航路”沿线国家。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还多半包含有经济和商业目的在内。不论是元朝发动的越南战争还是紧随其后的爪哇战争，都有一些负责招抚工作的随行人员与远征军同行，以笼络商人、增进贸易³³。但是，在入侵日本方面，却无法找到以振兴贸易为目的的随行人员出现在远征军中的记录。因此，说到底，经略日本只是元朝经略高丽与经略南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环。其结果正是由于背景不同，所以才导致了第三次入侵日本的计划无法实现。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次任皇帝元成宗铁穆耳于大德三年任命禅僧一山一宁为使节，促使日本向元朝进贡³⁴，但是与忽必烈时期相比，元成宗对待日本的态度明显弱化，已经不具备运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册封的意图。元成宗铁穆耳朝代之后，亚欧大陆中部地区的蒙古宗族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元朝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海域国家的军事入侵也就逐渐减少。因此，可以说，自元成宗铁穆耳之后，日本与元朝的战争才终于迎来了尾声。日本与元朝的贸易逐渐盛行起来，也在此之后。

那么元朝与日本战争的前后，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据村井章介研究，日宋与日元之间的海外交易中存在贸易船只往返次数限制、日本人出海限制、禁止铜钱流通等规定，但这些规定曾经全部都流于表面功夫³⁵。然而，在元朝发动第一次入侵后，镰仓幕府开始采取具体且有实效性的限制措施。弘安四年（1281），镰仓幕府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进入国内；正安二年（1300），给予镇西探题管理与监督外来人员的权限，并以“异贼防禁”为名强

³⁰ 《元史》卷一三 世祖纪一〇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癸丑

³¹ 《高丽史》卷二九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八月）丁未；卷三〇 世家三〇 忠烈王三 忠烈王十八年（九月）壬午

³² 有关东洋航路和西洋航路相关资料，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 的研究。

³³ 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5(b)，26-29 页

³⁴ 《元史》卷二〇 成宗纪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该国书的复刻版保存在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古文书》6773）

³⁵ 村井章介 2013(a)，264-266 页

化了镇西探题的军事功能³⁶。村井认为,以此为契机,公权力逐渐渗透进了博多地区。作为博多组成部分的博多浜与息浜,其背后的支配者各不相同,阻碍了博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公权力的干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元朝与日本的战争产生的短期军事冲击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冲击,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元朝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影响。关于元朝与日本战争之后的两国交往,榎本涉否定了战争之后贸易政策变得消极的传统观点,认为元朝方面针对倭船警戒的根据来自于对日招抚失败导致的日本不臣服³⁷。笔者亦赞同此结论。元朝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迫使日本臣服并将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之内,在此之后元朝对日警戒,与其说是对战争本身的反动,倒不如说是起因于没能将日本作为朝贡国纳入元朝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且,尽管元朝实施了警戒措施,仍然有众多商贸船只往返于两国之间,只能说,两国间海外贸易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两国政府的互不交涉、互不信任。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渠道更加强势。尽管当时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商贸船是中国的戎克船,但船只主要以满足日本需求的形式运行³⁸。这种日元贸易船在日本被称作“寺社造营料唐船”³⁹,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了贸易结构与内容的变化⁴⁰。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从元朝进口了包括宋朝钱币在内的大量中国钱币,银也在日本和元朝之间进行着双方向的流通⁴¹。蒙古帝国时期,银流通于整个亚欧大陆地区。此外,元朝统治下的书画、陶器、瓷器、茶文化等都与日本的中国文化接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持续到了明代——室町时代⁴²。在此当中,也包含有不完全是蒙古风格的要素,但毕竟是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与江南地区继承并发展起来的要素,作为元代文化仍然带有元代的特征⁴³。元朝后半期,日本与元朝之间的僧侣往来迎来了空前盛况,村井章介和榎本涉都将这一时期称为“渡来僧的世纪”⁴⁴。这些文化交流表面上给人一种看似与“蒙古冲击”没有什

³⁶ 镰仓幕府追加法四八八条(异国警固条)、七〇一条(牒使来着时在所并问答法事)(《中世法制史料集》第一卷,249页,307页);村井章介 2013,265页

³⁷ 榎本涉 2007(b),106-117页;森克己 1975,366-370页,511-525页。江静 2000,江静 2002

³⁸ 其理由在于,虽然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至元朝时,无需顾忌元朝制定的废止市舶司与禁止下海时间限制等规定,可以自由驶入元朝港口(主要是庆元港),但是返航时,这些船只如果碰上废止市舶司与禁止下海的禁令期间,则只能等待出海禁令解除后才能出港。详细内容,可参考四日市康博 2016的研究。

³⁹ 有关“寺社造营料唐船”,可参考村井章介 2003、村井章介 2013;中村翼 2013等研究。此外,有关“寺社造营料唐船”的具体事例,可参考福岛金治 1991;福岛金治 1996;永井晋 2010等研究。

⁴⁰ 南宋时期,博多出土了很多“纲”铭及“纲首”铭的墨书陶器、瓷器,但进入元代后,则很难见到相关出土物。这意味着宋代以“纲”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结构在元代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从新安沉船中出土了众多“纲司”铭的木简,此处的“纲司”是否与“纲首”的意思相同,又或者具有别的含义,到现在仍是未解之谜。

⁴¹ 从日本流向中国的银,据《至正四明续志》卷五记载,被作为“倭银”看待。日本银中,特别是对马银,经由庆元(今宁波)被进口到元朝。另一方面,在博多的圣福寺,江户时代的享保元年(1716)出土了元代的银锭,当时的出土情况记载于伊藤东涯的《盍簪录》。这说明了银的流通绝非单方向的,中国也有银流通至日本。(《盍簪录》卷四)

⁴² 相关具体事例,可参考村井章介 2003;榎本涉 2003等研究。

⁴³ 就极端事例而言,日本的唐物文化和禅宗文化中也可散见“蒙古文字”,即八思巴文。在日本,蒙古文被当作八思巴文,但并没有被积极地吸收进日本文化中,尽管如此,日本也留存在了少量的八思巴文。例如,常被用作茶壶的福建与广东生产的褐釉四耳壶(后被称作罗宋壶)和青瓷上时常刻画有吉祥文字,而在兵库县、鹿儿岛、博多(新安船)、冲绳等地出土了刻有八思巴文的印章及刻有八思巴铭文的青瓷(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2015;石垣市总务部市史编辑课 2008;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览町教育委员会 2006)。此外,室町时代后期,临济宗禅僧玉隠英與用八思巴文制作了刻有自己名字的落款印章(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3),后世认为他参考了记载了八思巴文汉字音对照表的音韵书《蒙古字韵》,十五至十六世纪玉隠担任过主持的建长寺,以及金泽文库等地,有可能保存着《蒙古字韵》一书。

⁴⁴ 村井章介 2013(b);榎本涉 2007

么关系的印象，但它们都是蒙古霸权兴盛下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很难说与“蒙古冲击”毫无关联⁴⁵。

尾论：究竟何谓“蒙古冲击”？

如果仅仅将日本作为主体来思考的话，人们往往容易认为“蒙古冲击”指的是战争本身为最大且具有主体性的冲击。事实上，传统的蒙古来袭研究，都主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战争发生前的外交关系以及战争本身。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观察亚洲海疆各地域发生的具体事例，就会发现“蒙古冲击”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性的冲击”，绝非仅仅只有战争，正是战后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给社会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更进一步可以确认的是，战争前与战争中产生的政治冲击对其之后的经济与文化冲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换言之，虽然元朝与日本（镰仓幕府、朝廷）双方都在战争期间对贸易和交往做了很多限制，而这些限制也对贸易结构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些状况和之后飘摇反复的贸易兴顺的状况作为一个整体的流程加以把握。正如前文中村井所述，日本在与蒙古交战后，立即强化了贸易管制，严格限制新的航船入境，由此，以在中国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即“宋商”）为主体的贸易转变为以在博多设置据点的汉商人（“宋商”的子孙后代）为主体的贸易，汉商人甚至逐渐在日本定居，于是，贸易的主体最终在室町时代（中国明代）转变为以包括“宋商”子孙后代在内的日本商人。总之，镰仓及南北朝时代（中国元代）是中日贸易结构转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转变与元朝对日战争及其之后的冲击有着深刻的关联。

本文受限于篇幅，故不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日本受到的“蒙古冲击”的内容究竟为何，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解释“蒙古冲击”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这些短期冲击还带来了经济与文化上的冲击。关于本文主题的准确性，还必须将日本以外的地域纳入研究对象范围内，通过具体事例加以验证，而这，也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史料

《元史》：《元史》校对本. 15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

《蒙古字韵》：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蒙古字韵校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四明续志》：中国地志研究会（编）《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地方志丛书. 台北：中国地志研究会，1978.

《高丽史》：国书刊行会（编）《高丽史》上中下. 国书刊行会，1977.

《盍簪录》：森铨三等（编）《随笔百花苑 6》东京：中央公论社，1983 所收.

《镰仓幕府法 追加法》：佐藤进一、池内义资（编）《中世法律史料集 第一卷 镰仓幕府法》东京：岩波书店，1955 所收.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

-Marco/F/Benedetto: Luigi Foscolo Benedetto (ed.), *il Milione :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 Firenze, 1928.

-Marco/R/Einaudi: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ed.), *I viaggi di Marco*

⁴⁵ 实际上，在元朝与日本的战争期间，镰仓幕府借助留日的中国僧侣和留中的日本僧侣构成了信息网络并加以充分利用，开展了信息收集和谍报活动。元朝时的对日僧侣往来活动虽然被称为“渡来僧的世纪”，可以说，这也是前者的延伸。有关蒙古来袭时的僧侣活动及后续发展，可参考伊藤幸司 2009、伊藤幸司 2010。

Polo. In *Navigazioni e viaggi*. vol.3, Venezia, 1559 (Giulio Einaudi (re.ed.), Torino, 1980.)

参考文献

榎本涉 2003 《关于陸仁与道元文信（「陸仁と道元文信をめぐって」）》《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212-269 页（原载：《14 世纪后半来到日本的人们（「一四世紀後半、日本に渡来した人々」）》、《遥远的中世（『遙かなる中世』）》20，2003.）

榎本涉 2006 《早期日元贸易与人员交流（「初期日元貿易と人的交流」）》《宋代的长江流域——基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宋代の長江流域——社会經濟史の観点から』）》东京：汲古书店，231-272 页。

榎本涉 2007 (a) 《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

榎本涉 2007 (b) 《元朝的倭船对策与日元贸易（「元朝の倭船対策と日元貿易」）》《东亚海域与日中交流——19-14 世纪（『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一四世紀』）》东京：吉川弘文馆，106-175 页。

榎本涉 2014 《宋元交替与日本（「宋元交替と日本」）》《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 第七卷 中世 2（『岩波講座 日本歴史 第七卷 中世 2』）》东京：岩波书店，77-112 页。

榎本涉 2015 《13 世纪的东亚局势与高丽、大越、日本（「13 世紀の東アジア情勢と高麗・大越・日本」）》《日越交流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各课题（『日越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社会、文化の諸課題』）》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7-24 页。

深见纯生 2004 《元代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据点？（「元代のマラッカ海峡——通路か拠点か」）》《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18，86-98 页。

深见纯生 2006 《单马令的发展与 13 世纪东南亚的商贸高潮（「ターンプラリンガの発展と 13 世紀東南アジアのコマーシャルブーム」）》《国际文化论集（『国際文化論集』）》34，81-97 页。

福岛金治 1991 《关于镰仓极乐寺的唐船派遣（「鎌倉極楽寺の唐船派遣について」）》《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233。

福岛金治 1996 《中世镰仓律院与海上交易权——热海船的特性与镰仓大佛造营料唐船的派遣情况（「中世鎌倉律院と海上交易権——熱海船の性格と鎌倉大仏造营料唐船の派遣事情」）》《镰仓大佛研究（『鎌倉大仏研究』）》1

石井正敏 2010 《关于文永八年三别抄牒状（「文永八年の三別抄牒状につい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 史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 史学』）》56，1-34 页。

石垣市总务部市史編集課 2008. 《石垣市史考古视觉版 5 从陶瓷器看交流史（『石垣市史考古ビジュアル版 5 陶磁器から見た交流史』）》石垣市。

伊藤幸司 2009 《外交与禅僧——东亚交流圈中禅僧的作用（「外交と禅僧——東アジア通交圈における禅僧の役割」）》《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と文化』）》24，41-70 页。

- 伊藤幸司 2010 《跨越东亚的禅宗世界（「東アジアをまたぐ禅宗世界」）》 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日本的对外关系 4 倭寇与“日本国王”（『日本の対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 东京：吉川弘文馆，30-56 页。
- 江静 2000 《元代赴日中国商船锐减原因初探》《中日文化论丛》1998。
- 江静 2002 《元代中日通商考略》《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1。
- 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览町教育委员会 2006. 《国家制定遗迹 知览城（三）（『国指定遗迹 知覧城（三）』）》 知览町：鹿儿岛县川边郡知览町教育委员会。
- 川添昭二 1993 《镰仓末期的对外关系与博多——新安沉船木简、东福寺、承天寺（「鎌倉末期の対外関係と博多——新安沈没船木簡・東福寺・承天寺」）》《镰仓时代文化传播的研究（『鎌倉時代文化伝播の研究』）》 东京：吉川弘文馆。
- 李康汉 2016 《高丽的蒙古冲击与反应（「高麗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とレスポンス」）》《国际研讨会“亚欧大陆的蒙古冲击”文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モンゴルのインパクト」予稿集』）》 东京：昭和女子大学。
- 桃木至朗 2011 《中世大越国的成立与变容（『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 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
- 森克己 1975 《日宋贸易研究（『日宋貿易の研究』）》 东京：国书刊行会。
- 森平雅彦 2013 《蒙古霸权下的高丽——帝国制度与王国的应对（『モンゴル覇権下の高麗——帝国秩序と王国の対応』）》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编）1981-85『新安海底遺物（資料篇 I-III）』 서울：한국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编）1988『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 서울：한국 문화 공보부 문화재 관리국。
- 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文化財庁, 国立海洋遺物展示館)（编）2006『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1-3. 목포：문화재청, 국립해양유물전시관。
- 村井章介 1988(a) 《高丽三别抄叛乱与蒙古来袭前夜的日本（「高麗・三別抄の叛乱と蒙古襲来前夜の日本」）》《亚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 东京：校仓书房，1988，144-188 页。
- 村井章介 1988(b) 《蒙古来袭与镇西探题的成立（「蒙古襲来と鎮西探題の成立」）》《亚洲之中的中世日本（『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 东京：校仓书房，1988，189-235 页（根据原载《史学杂志（『史学雑誌』）》87/4，1978 改编）
- 村井章介 2003 《日本交通与禅律文化（「日元交通と禅律文化」）》《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171-

213 页（原载：《日本の時代史 10 南北朝動乱（『日本の時代史 10 南北朝の動乱』）》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

村井章介 2010 《蒙古来袭与异文化接触（「蒙古襲来と異文化接触」）》《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

375-400（原载：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日本の对外関係 4

倭寇与“日本国王”（『日本の对外関係 4 倭寇と「日本国王」』）》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

村井章介 2013(a) 《再论寺社造营料唐船——贸易、文化交流与沉船（「寺社造营料唐船を見直す——貿易・文化交流・沈船」）》《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

（『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41-272 页.

村井章介 2013(b). 《从肖像画“赞”来看禅的中日交流（「肖像画・賛から見た禅の日中交流」）》《日本中世的异文化接触（『日本中世の異文化接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73-294 页.

永井晋 2010 《从金泽文库古书看唐船派遣资料（「金沢文庫古文書に見る唐船派遣資料」）》《金泽文库研究（『金沢文庫研究』）》324.

中村翼 2010 《镰仓幕府“唐船”相关法律的探讨——以“博多权门贸易”说的批判性继承为目的（「鎌倉幕府の「唐船」関係法令の検討——「博多における権門貿易」説の批判的継承のために」）》《镰仓遗文研究（『鎌倉遺文研究』）》25.

中村翼 2013 《日元贸易期的海商与镰仓、室町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的历史地位（「日元貿易期の海商と鎌倉・室町幕府——寺社造营料唐船の歴史的位
置」）》『ヒストリア』241.

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国立博物馆（编）2003. 《镰仓——禅的源流（『鎌倉——禅の源流』）》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

Prawdin, Michael 1937. The Mongol Empire: Its Rise and Legacy. (tr.) Eden and Cedar Paul. Brunswick and London: Aldinetransaction.

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2015. 《谜之八思巴字与光明山（『謎のパスパ文字と光明山』）》龙野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佐口透 1970 《鞑靼和平（「タタールの平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中世 3（『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中世 3』）》东京：岩波书店.

四日市康博 2001 《蒙古和平——东西交通的繁荣（「パクス・モンゴリカ——東西交通の繁栄」）》『しにか』140，50-55 页

四日市康博 2015(a) 《基于亚欧视角的伊利汗国公文书——兼作伊利汗国公文书研究序论（「ユーラシア的視点から見たイル=ハン朝公文書——イル=ハン朝公文書研究の序論として」）》『史苑』75/2，257-300 页.

四日市康博 2015(b) 《13-14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与贸易——以基于元朝视角的元朝与西洋航路南海诸国的关系为中心（「13~14 世紀における中国—東南アジアの通交と貿易——元朝から見た西洋航路上の南海諸国との関係を中心に」）》《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纪要》21，13-41 页.

Yokkaichi Yasuhiro 2015. (ed.) Special Issue: Multilingual Documents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in Mongol-Ruled Iran, in *Orient* 50.

四日市康博 2016 《14 世纪的日本与元朝海上贸易中的新安船（「14 世紀の日本と元朝の海上交易における新安船」）》『新安선 발굴 40 주년 기념

국제학술대회——아시아·태평양 해양네트워크와 수중문화유산』목포시:

국립해양문화재연구소, 164-184 页.